

徐友渔: 8 级地震大考中国

灾难提醒我们抛掉那些虚骄之气 代之以一个健康、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和看待世界

汶川大地震夺去了数万中国人的生命,数百万中国人无家可归,十三万方中国人感同身受。异常惨重的灾情,犹如一次非常规的考试,摆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前方,总书记、总理阵前指挥,官兵奋力向前,民间力量初显身手,灾民顽强自救;后方,企业、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整个中国爱心涌动。每一个中国人都以自己的行动在这张沉重的试卷上填写着自己的答案。6月5日,快报星期柒新闻周刊连线著名学者徐友渔,这位亲身经历过1976年松潘、平武大地震、1999年台湾9·21大地震的“地震行家”,以一个个观察者身份,对这份仍在答题中的试卷,对这份试卷的答题者——政府、官兵、媒体、志愿者……一一进行了理性分析。



徐友渔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单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单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布里斯托尔大学、雷丁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香港中文大学等访问学者,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任客座教授。



应急能力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星期柒新闻周刊:6月7日,全国高考开始了。其实,换个角度看,这次汶川大地震对于中国人来说也是一次特殊的考试。您觉得呢?

徐友渔:我也倾向于从这个角度做一次观察,这不是因为你们采访我,我才这么说的。为什么呢?我曾经经历过一些大地震。1976年唐山发生大地震以后,四川的松潘、平武一带又发生了一次大地震,我当时在成都。成都那附上百万人长时间在广场上、公园里、大街上露宿。1999年台湾大地震的时候,我碰巧在台湾,在那里做学术访问。这次5·12汶川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又刚好在四川。经历了这么多大地震后,我的脑袋变得比较冷静和清醒。所以,这次一发生地震,我就招呼别人,跑下楼之后,告诉人们不要在靠近楼房的地方聚集,那样会很危险,要到空旷的地方去。这之后我就观察这件事,观察各方面的反应到底怎么样。所以我跟一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这次地震发生后,给人印象很深的一点是媒体反应迅速,在很短的时间内,人们就通过电视、网络了解到了最新的实情。

徐友渔:我也注意到这一点,对这次信息的传播速度感受很深,但我的参照系要多一些。台湾9·21大地震发生的时候,我住在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招待所。我一感到楼房晃动,就马上往楼下跑,同时招呼叫的国家的科学家出去躲避。到了楼下,大概20分钟以后,就看到有人拿着收音机在听,各种现场直播也就都开始了,对各地的受灾和抗灾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所以在报道和信息传播方面我们这是有改进和提高的空间。这次有四川的时候,我等待有关消息的时间要比在台湾久一些。地震

发生后,当地政府没有任何信息发布,大家都处在焦虑和恐慌之中。

我觉得我们的应急机制还没有非常健全地建立起来。比方这次大地震,我很希望当地政府能够针对当地居民的心理迅速作出反应——这个地震震害有多大?我们离震中有多远?我们这个地方是安全的吗?我们应当做些什么?这种反应从地方政府来说做得还是有欠缺的。

中央政府的应对措施迅速高效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经历过多次大的地震,相比较而言,您如何评价这次中央政府所采取的应对措施?

徐友渔:总的来说是相当得当的。中央政府的反应是惊人地有效率。就算地震发生了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对地震的破坏程度,一般來說不会知道得很详尽,但是你看这次中央的反应,温总理第一时间飞到灾区。我们当然知道,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到达一个灾区指挥抗灾表现了中央的关心和重视程度。但是反过来讲,也不能随便出了一件事,总理就得到出事现场啊。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央对这次地震严重性的估计、判断以及反应是很到位的。中国这么大,每年每月甚至每天都有或大或小的天灾人祸,总理去不去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你不能简单地总说理去了就好,总理不去就不好。中央这一次这么快就有这么一个决定,判断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灾害,是要有足够的重视和水平才能做到的,是很不容易的。

人的生命,不单属于个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分量

星期柒新闻周刊:温总理说,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百倍努力,在他,在中央看

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这次救援把人放到了一个压倒一切的位置。

徐友渔: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给了我深刻的印象。因为中国以前有一种观念,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以前都是把国家财产放在第一位的,对个人的生命相当不关心。我小的时候,国家树立的一个榜样就是向秀丽。女工向秀丽所在车间的无水酒精精烧起来了,很危险,向秀丽没有逃开,她用自己的身躯扑到燃烧的酒精上,最后就壮烈地牺牲了。现在我们回过头看,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当然国家财产也很重要,但是厂房是可以重建的,一个人的生命是不可能第二次的。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是把人的生命放到非常次要的地位。一出事情首先要抢救国家财产。到文化大革命,发展到最厉害的时候,树立了另外一个典范叫金训华,河里漂流了一些国家的木材,他为了去抢救那些木头就淹死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过去我们从来都是把生命放在一个次要、被漠视的位置。这次把这种观念彻底扭转过来了。人的生命是最重要的。救灾中把人的生命放在重要位置,实际上就是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了实践层面。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仅是中央在救援时重视人的生命,而且媒体在报道时,也对把个人的尊重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对幸存者来说这是积极的报道,体现了这种文化。

徐友渔:通过这一次震灾,中国人的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一次标志性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情。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仅仅是尊重幸存者的求生欲望,国家哀悼日的设立,为普通遇难者降半旗,把尊重死者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徐友渔:这说明人的生命,不单属于个体,在国家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中也占有重要的分量

星期柒新闻周刊:您怎么评价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在救援中的表现?

徐友渔:在抗击天灾的时候,部队从来都是起最重要的作用,做出最大贡献的,最艰苦的地方、最危险的地方总是有他们的身影。我们中国有这么一个传统的。这一次部队

官兵赢得人们的尊敬也是理所当然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不要忘记灾民,他们不仅自救,而且老师教学生,父母保护孩子,孩子鼓励孩子,出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徐友渔:这是抗震救灾中非常重要、非常特殊,也是非常感动人的一个群体。这也可以做一个对比,这一方面,我也有一些经验。大概十多年前,发生过那么大的地震,我在电视上看到这样的画面:部队开进来以后,灾民就抄着手在那里看,仿佛不是自己的事情。搭帐篷、建房子啊,都是“外人”在干,灾民就像是看客。吃的、穿的、用的,递到他手上他才摸一下,那种自力更生、自救的意识完全没有,当时我看到心里很不是滋味的。虽然我们国家有这个传统,一旦发生灾害,国家就会派人去救他们、照顾他们,他们却不顾自己的安危去救别人,而且他们是在坍塌的废墟里面互相鼓励、唱歌,孩子们以及灾民们在大灾中忍受苦难渴望生存的精神是很值得大家尊敬的。

星期柒新闻周刊:灾民之外的中国人,或献血、或捐款,表现得很踊跃。

徐友渔:整个中华民族在面对这次大灾时表现得相当好。大家对灾情都很关注,看电视直播,看网络滚动新闻。我和同事、朋友见面,大家不淡白的,一定只谈地震。而且国人,包括海外华人捐款非常踊跃。一些文化名人,清水衙门,收入水平不高,但是捐款都比较多。演艺界的人士表现得也相当不错。体育明星、歌星、电影明星,他们有的到灾区,面对面地鼓励灾民,相当不错。

决不能再让一个百姓受到伤害 ——温家宝

6月5日温家宝总理察看唐家山堰塞湖时,强调“决不能再让一个百姓受到伤害,确保群众安全”。

6月6日温总理再次飞赴堰塞湖坝顶,实地察看灾情。图为温总理顶着螺旋桨产生的巨大气流艰难靠近直升机,准备返回绵阳时的情景。

新华社图

一年一度的全国统一高考如期开始,但据报道,在地震灾区,还有9万考生不得不得延期举行高考。但我深信,在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的关心和支持下,无论如期还是延期参加高考的灾区考生,都能够顺利完成考试,并得到公正、适当的照顾。

其实,全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史无前例的“高考”——如对战胜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建国以来灾情最严重、影响最大的地震灾害。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取得了抗震救灾的初步胜利,但这场“高考”还在进行,要取得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高分”,还需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再接再厉。

就震灾本身而言,余震不绝,6月5日青川还发生了5级余震。从历史资料看,1748年2月23日(清乾隆十三年正月廿五日),汶川发生6级地震,并引起地质灾害,波及一百多个州县。同年5月2日(四月初六),松潘黄胜关6级地震。8月30日(闰七月初

七),康定西北地震,不到一天内震了7次,波及范围很大,包括汶川一带。10月12日(八月廿四日)小金西北地震,又波及成都等二十多州县。1786年6月1日(清乾隆五十一年五月初六),康定南发生7级以上地震。老虎崖大山崩裂,壅塞河道,形成堰塞湖,水位高二十余丈。10天后溃决,下游村落农田被夷为平地。余震持续数月。1933年8月25日,茂汶县叠溪发生7.4级地震。40多天后,因山崩导致岷江断流而形成的堰塞湖突然溃决,叠溪城陷没,灌县(今都江堰市)以上村镇被夷为平地,死亡人数超过此前。

汶川震区地形复杂、地势险峻,地震引发的地质灾害极其严重,形成的堰塞湖不逊唐家山一个,并有可能形成新的堰塞湖。时又进入多雨季节,危险性更大。由于以往的严重次生灾害大多发生在人烟稀少的地方,缺乏第一手的观测记录和相关数据,更缺乏治理经验,增加了治理的难度。而且,由于迄今为止,人类还无法准确预报地震及余震,很难排除发生新的地震或强余震的可能性。

就灾区社会而言,在抢救生命和初步安置完成后,过激

一些科研单位和一些部门,大力宣传自己有多少院士去了救灾现场。我觉得派院士去灾区也可能起好的作用,因为院士的水平很高,但是在很多情况下,派院士去是没有特别意义的,很多院士年事已高,院士的高深学问不一定派得上用场。另外,一些单位有在救灾方面刻意制造亮点的倾向。有些单位的抗震工作做得比较好,姿态也很高,但是并没有做到精打细算,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一些正常的业务也耽误了。坦率地说,我对四川省电视台的节目感到不是很满意。它们跟中央电视台比要差一些。灾害是发生在一周的,地震发生后,我有一周在四川。我首先要看的是四川电视台,四川台我觉得它很多东西做得很好,但是我感觉它有一点问题。我最想知道的是灾害的程度,救灾到了哪一步,但是我看看四川台看到最多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当地首长的表现,省委省政府、各级政府是怎么重视抗震救灾的,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把歌颂本地政府抗震救灾的政绩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二位的是宣传好人好事。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旧套路的在里面,是本来未倒置。以前我们的套路是,灾害发生了,第一件事情不是谈灾害怎么发生的,有多大的破坏,出于本性,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这些,而我们的第一条消息是领导干部怎么领导抗击灾害,然后才是灾情的报道。对于四川台来说,这几日套路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他们这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

四川没有受灾的地方很多,可实施本省对口支援

星期柒新闻周刊:抗震救灾还在继续进行,您有什么建言?

徐友渔:两点。一点,央视的白岩松去了灾区,他说他到了灾区后,才知道灾区的困难不是他在北京可以想象的,所以他呼吁抗震救灾的浪潮应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多难兴邦 期待交出圆满答卷

超声波 Ultrasonic Wave 葛剑雄本刊独家时评

高温多雨的夏季是一场新的考验。尽管政府已尽了最大努力,短期也无法使所有灾民都迁入过渡房。即便迁入过渡房,也难使他们保持灾前的生活水平。继续生活在帐篷中的灾民自然更加艰苦,防署、防疫、防病的担子更重。暑假即将开始,灾区学生如何过暑假,如何让师生得到适当的休息调整,保证今后的学业,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中国有句老话:救急不救穷,国内外的捐助热情再高,捐助量再大,也只能救一时之急。要使震区得到全面恢复,并建成更美好的家园,还得靠各级政府的领导和支持,靠灾民人民的奋发自强,靠全国人民的分担。党中央、国务院已作了及时周密的规划,全国对口支援的方针已经确定,接下来需要的是全国人民的动员和行动。

旧时代的统治者救灾的标准只是活命,能使灾民不死就是最大的德政。而在今天这场“高考”中,中国的标准是在灾

区迅速重建幸福和谐的社会,让灾民和全国人民一样过上美好的生活。

我们说“多难兴邦”,自然不是说灾难本身能兴邦,或者灾难越多邦越兴,而是说人不怕灾难,越是多难越是坚忍不拔,奋发图强,邦才能更兴。中国的一大优势,就是应对灾难的举国一致体制,不受灾的地区不仅会全力支援灾区,还能激发起增产的热情和能力,完全可能在总体上更上层楼。

自公元前780年以来,中国已经历过数千次破坏性地震,包括死亡超过百万的8级地震。近代以来四川也经历过多次7级以上大地震,其中建国以来就有3次。但四川没有被震垮,中国没有被震倒,而是发展成为拥有13亿人口和经济实力居世界前列的大国。既然如此,中国必定会在今天这场“高考”中交出圆满的答卷。

葛剑雄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等职。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

葛剑雄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学者,现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等职。从事历史地理、中国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

性安置和重建的任务更加繁重。如果说,在地震发生之初,无论是灾民本身还是救援者,主要的或唯一的目标是活下来;那么到了今天,就得考虑如何活得好,不仅要生存下去,还要恢复和进步。如果说,当初只考虑生和死,今天不得不面临复杂的社会或个人矛盾。例如,尽管银行、保险等部门已经为灾民采取了简化手续、优先理赔、免除房贷等一系列措施,但还有不少难题要解决,如废墟中发掘出的财物如何处理,公私财产的损失如何确定,个人间的借贷、个人与法人间经济纠纷、民事纠纷如何了结,在证据、物证、人证、证言都缺少的情况下如何进行调解或判决,家庭、婚姻、供养、继承、赔偿、馈赠等关系如何确定,档案、证件、法律文书如何合法、如实、公正、合理地恢复和重建,都缺乏现成的经验,也都可能引发新的矛盾甚至冲突。

在震灾之初被极度恐惧、震惊、悲伤所制止或麻木的人情在逐步恢复,在生死抉择之际不得不暂停的七情六欲也必然需要宣泄,如此沉重的心灵创伤绝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愈合,对青少年的潜在影响更不易消除。在情感关怀和心理疏导方面,过犹不及,锦上添花不

该是持久的,不要来得猛退得也快,这一点他说得非常到位。第二点我觉得灾后重建是一个系统工程,一定要讲究它的科学性,形式主义的东西最好要少一些。灾区重建要考虑经济成本,要综合考虑社会效益,很多院士年事已高,院士的高深学问不一定派得上用场。另外,一些单位有在救灾方面刻意制造亮点的倾向。有些单位的抗震工作做得比较好,姿态也很高,但是并没有做到精打细算,花了很多不该花的钱,一些正常的业务也耽误了。坦率地说,我对四川省电视台的节目感到不是很满意。它们跟中央电视台比要差一些。灾害是发生在一周的,地震发生后,我有一周在四川。我首先要看的是四川电视台,四川台我觉得它很多东西做得很好,但是我感觉它有一点问题。我最想知道的是灾害的程度,救灾到了哪一步,但是我看看四川台看到最多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当地首长的表现,省委省政府、各级政府是怎么重视抗震救灾的,这当然很重要,但是可以看出,他们把歌颂本地政府抗震救灾的政绩放在第一位,放在第二位的是宣传好人好事。这些都是需要的,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旧套路的在里面,是本来未倒置。以前我们的套路是,灾害发生了,第一件事情不是谈灾害怎么发生的,有多大的破坏,出于本性,人们首先关心的是这些,而我们的第一条消息是领导干部怎么领导抗击灾害,然后才是灾情的报道。对于四川台来说,这几日套路还是或多或少存在的。他们这方面还有改进的余地。

四川没有受灾的地方很多,可实施本省对口支援

星期柒新闻周刊:抗震救灾还在继续进行,您有什么建言?

徐友渔:两点。一点,央视的白岩松去了灾区,他说他到了灾区后,才知道灾区的困难不是他在北京可以想象的,所以他呼吁抗震救灾的浪潮应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 倪宁宁

报快报记者